

# 人文经济学:重塑共同富裕衡量尺度与实践路径

杨文圣 熊文军

##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长期以来,GDP(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主导着各国政策制定与发展评估。然而,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随着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发生变化,这一指标反映社会福祉、公平正义、生态环境与人民幸福感等局限性日益凸显,无法全面反映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在2023年两会“下团组”时,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为什么要树牢新发展理念时就明确指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走那种急就章、竭泽而渔、唯GDP的道路”。

科学构想。这一科学构想与人文经济学在核心理念上有着同构性。人文经济学认为,共同富裕的最终落脚点是促进人的能力提升、价值实现与自由全面发展。基于这一理念,衡量共同富裕的尺度必须包含人的发展维度,包括教育机会、职业技能、健康水平、休闲时间、社会参与等多方面能力指标。同时,社会和谐与生态宜居也是衡量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尺度。人文经济学所蕴含的“和合共生”智慧与民本思想,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是衡量共同富裕的重要尺度。

### 二、创新机制 人文经济学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方位

人文经济学不仅重构了共同富裕的衡量尺度,还通过一系列创新机制,为共同富裕,特别是精神共同富裕提供了实践方位。这些机制将文化资源、人文价值、道德理念融入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使精神富裕与物质富裕协同推进。

一是文化资源转化机制。人文经济学强调文化创新激活经济内生动力,通过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一方面推动文化产业化,持续壮大文化产业规模,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另一方面推动经济文化化,提升产品与服务的文化内涵与附加值。这种双向转化机制,使文化不再是经济的附庸,而是经济发展的灵魂,有效黏合了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要素,营造出更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环境。

二是人文教育赋能机制。人文经济学重视崇文重教传统,通过教育普及促进人的现代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与科技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三者的融合发展,需要人文经济学所倡导的崇文重教氛围的营造。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须将教育作为基础性工程,特别是注重人文素养与职业能力的协同培养,激发人们的创新创造活力。

三是文化生态营造机制。通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红色革命思想文化,不断提升人民精神文明素养。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持续营造充满活力的人文环境,提供多元优质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满足差异

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这种文化生态营造既包括实体文化空间的建设,如富含天津地域文化特色的天津古文化街,也包括制度环境与价值观念的塑造。通过文化生态营造,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持续的精神动力,也使共同富裕具有更深厚的文化根基。

四是城乡协同发展机制。人文经济学关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创新,通过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动共同富裕的全面实现。这种城乡协同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的互补,更体现在文化层面的交流与融合。城市与乡村作为不同的文化空间,承载着不同的文化资源与生活方式,通过良性互动,可以创造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 三、路径选择 推动共同富裕的衡量尺度与实现机制落地

从人类文明互鉴的角度看,人文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辩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发展而来的,其以文化和经济的双向驱动贯穿始终,进而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局限。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导下的现代社会危机反思中,西方学者的一些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启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本质上是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并压倒价值理性的过程。他形象地称之为“理性的铁笼”:我们越来越擅长如何做事(工具理性),却逐渐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价值理性),人被困在追求效率与计算的系统之中。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其晚年出版的一部作品《不平等的灾难》中对GDP这一衡量经济增长的核心指标提出了批判,深刻揭示了“经济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途径”这一论调背后的实质性危机。他认为,当一个社会将GDP增长奉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并相信与之配套的消费主义、竞争公正等谎言时,其结果必然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人文价值的失落。

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征程上,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现代性困境的反思值得我们警醒,也为建构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借鉴参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擘画国家发展蓝图时,将扎实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突出位置,明确了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未来,应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从制度建设、技术赋能、全球传播等多维度构建实施路径,使共同富裕的衡量尺度与实现机制真正落地生根。

一是构建多维衡量指标体系。要真正超越GDP,必须构建一套能够全面反映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的多维衡量指标体系。这组指标应涵盖民生保障、文化供给、生态环境、社会参与等多个维度,包括就业质量、公共服务可及性、文化资源丰富度、生态环境质量、社会信任度等具体指标。通过这些指标的监测与评估,可以更加全面地“把脉”共同富裕的进程,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与短板。

二是数字技术赋能人文发展。数字时代为人文经济学与共同富裕的融合提供了新的可能。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文化表达形式,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通过数字平台,可以打破时空限制,使文化资源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共享,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对于农村和偏远地区,数字技术可以大幅提升文化服务的可及性与质量,缩小城乡文化鸿沟。

三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人文经济学汲取马克思主义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能够突破西方经济学以逐利为导向所引发的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等难题。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其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融入现代社会,培育时代新风新貌。

四是促进文明交融与全球对话。人文经济学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共生”智慧与民本思想,又融合数字时代的技术创新优势。这种开放性、包容性特征,使其能够积极参与全球对话,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丰富共同富裕的内涵。通过加强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为我国共同富裕实践注入新的活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开启了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新征程上,我们需要继续深化对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将文化的活力注入经济体系,将人文的价值融入社会建设,使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辅相成,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相得益彰。唯有如此,才能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

回溯往昔,无论是儒家描绘出的财富共享、社会和谐的“大同社会”理想,还是道家提出的“损有余而补不足”以及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朴素共富思想,都反映出中国古人对免于贫困、社会和谐、天下共享共富理想状态的孜孜追求。而今,在党的坚强引领下,我们不仅圆了全面小康的梦想,更把这份跨越时空的共富追求,绘成了“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以物质富足托举生活品质,以精神丰盈点亮人生价值。面向未来,这一追求会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继续生长,让每个人都能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滋养中绽放光彩。

(作者分别为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大学基地研究员;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

白云翔

崇之心对待城市中的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等“有形”的文化遗产,同时加强对传统技艺、民风民俗、人物典故等“无形”文化遗产的整理和阐释,特别是注重发掘其时代价值,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二是要精心“铸魂”,打造具有鲜明标识和深刻内涵的城市精神。例如,“因河而生、向海而兴”的天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意蕴丰富的津派文化,并以此为根基塑造了“爱国诚信、务实创新、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成为天津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三是要大力“塑形”,充实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文化生活是文明城市不可或缺的内容,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文化作品,创新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群众精神境界。

一、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我国在数千年就出现了城市这一人类赖以生存居住的基本形态,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特定的城市建筑风格,中国建筑也被公认为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之一。许多建筑一经建造,就不再只是砖瓦木石的堆砌,更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贴地的音符,代表着一种对生活的审美意趣和与自然的无声交流。特别是历经时间的沉淀,每一座建筑都在岁月里留下沧桑的故事,使后人能够感受那份独特的文化智识和文化气度,进而在这种美的滋养中完善道德、丰富精神。

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必须加强城市风貌管理,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从宏观上看,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

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城市建设不能“摊大饼”,否则就会滋生和助长“城市病”。要加强对城市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的整体规划和管控,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从微观上看,要明确城市定位,合理规划城市建筑。梁思成先生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科学地对待城市,意味着不能一味贪大,追求大马路、大广场、大绿地、大园区,忽视土地利用效率;意味着不能崇洋媚外,脱离城市既有文化传统,把城市建设变成国外城市建筑设计师的试验场;意味着不能盲目复古,搞“拆真古迹、建假古董”那样的事。城市建设必须融合中华美学和时代风尚,契合城市外在形象和精神内质,服务于城市发展的健康持续和城市品位的整体提升。

### 三、人民是城市的主人

“城者,所以盛民也。”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发展的关键是以人与人和谐相处,因此城市工作不能“见物不见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加速转型,传统道德体系所依赖的社会环境不断瓦解,城市化也因此被人们视为冲击传统人伦关系的破坏性力量。但城市生活在取代传统社会生活结构的同时,也为建构新的伦人关系提供了客观条件。通过对社会文明风尚的有效引导,城市完全可以被打造为保障人伦交往条件的伦理空间,进而实现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相融共生。

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必须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一是要充分发

挥市民主体作用,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动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市民文明素质决定着城市文明程度。应持续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弘扬诚信文化,强化道德教化功能,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二是要妥善处理外来人口与城市常住人口之间的关系,培养和谐包容、友善亲和的城市文化。下大力气破除“玻璃门”现象,让不同群体享受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务和市民权利,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都能找到归属与尊严。三是健全公共参与机制,保障和拓宽市民参与城市建设与管理的有效渠道。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探索推广小院议事厅、围炉夜话、网络问政等形式,多方面征求市民意见,开创城市建设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良好局面。

总之,“文明城市”的目标意味着城市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重要转变,体现了我们党对城市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反映出党在城市建设中的科学态度和先进理念。文明城市说到底是人民城市,文明城市的建设宗旨是为人民群众谋福祉,文明城市的建设要靠人民群众来参与,文明城市的成效需要人民群众来检验。我们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文明城市建设的精细化水平,一针一线绣出文明城市的品位、品质和品牌。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委托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研究”TJESDZX22-021阶段成果)